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编者按: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看到的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起了新的问题、新的争议。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人类的主体性是否动摇?虚实的边界日渐模糊,法律的规范如何同步?大众日报理论周刊本期推出专题,探讨人工智能善治之方。

人工智能将把人类文化引向何方

□ 解学芳

■在人机协同塑造文化新范式过程中,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创意、情感与价值判断如何和人工智能完美结合,确保具有情感和审美力的“人”作为主体,实现人机“共同进化”,这是智能时代文化创新的内核与关键所在

虑和威胁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远忧——对于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创意阶层而言,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受到巨大的挑战。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是部分介入文化生产领域成为人类的辅助工具,还是全方位进入文化创意领域进而替代人类?这逐渐成为热议的现实命题。

文化新图景与文化隐忧并存

人类文化变迁史实质是技术创新史。人工智能技术爆炸性演进,使其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支配性技术,即形成了一个由大数据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高新技术群的聚集,变革着文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文化内容的创制和传播,形成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文化生产之间自生、共生、再生的关系。特别是2023年以来,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深度介入人类文化生产,从“人-人”关系走向“人-机”协同发展,造就了全新的AIGC模式。所谓AIGC模式,是指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内容场景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

AIGC作为文化新质生产力,依托内容自动化生成的训练数据、芯片算力、深度学习算法、场景决策模型、多模态技术等人工智能技术集合,打造了一个“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文化产品更加富足、文化生活更加多彩”的新文化图景,也带来了数智文化的崛起和传统文化业态的衰退。从AIGC模式的技术本质来说,人工智能理解真实世界的能力进一步跃迁,以“全知全能”的角色介入文化应用多元场景——包括文学作品、绘画、短视频、游戏乃至长视频、影视制作等文创内容的生成,也包括文化内容智能运营和智能传播领域的音视频智能营销,以及虚拟偶像、虚拟演员、虚拟导游、智能剪辑、AI审核与评级等服务。从AIGC模式赋能的文化体验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在交互中赋予受众感官体验与审美能动性——在跨智能感知与虚拟现实技术的支撑下,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电视通过语音交互、面部表情、脑电波数据捕捉打造受众全感官的体验,并通过受众心理与文化偏好的智能反馈机制,带来文化体验感的延伸与升级。

虽然AIGC作为新质生产力和内容生产模式会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持续创新,但在技术属性上,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未来

的突破性发展仍然会受到算力、算法、伦理法规的制约,对其保持积极且审慎的态度至关重要。特别是AIGC模式在带来文化生产周期短期化与人类文化生产能力跃升的同时,也带来全新的文化隐忧。

一是AIGC模式下文化内容的机械式创作和情感缺失。AIGC模式模糊了人类创意与机器填充之间的边界,大部分AIGC文化产品存在一定的拼凑感以及情感缺失局限性——基于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进行的内容生产,创作者不再是情感的表达者与内容的创作者,而成为文字的批量生产者。

二是AIGC模式下文化生产隐含意识形态风险。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AIGC大数据语料的语种选择也会对生成的文化产品价值倾向产生影响。以ChatGPT为例,OpenAI公布的资料显示训练ChatGPT的数据资料大多来源于英语国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机构、团体和社会平台,将不可避免地隐含西方价值观念。

三是深度合成乃至深度伪造带来的侵权风险增加等新型安全危机。AIGC可能会偏离客观中立的初衷,生产出继承并强化训练作品中固有的种族主义、性别偏见、暴力、色情等负面因素的虚假报道、不良文学作品、恶意视频等内容。如OpenAI的图像生成模型DALL-E、谷歌的Imagen模型均曾被指存在性别歧视问题;而Stability AI曾被指控为“复杂的拼贴工具”,侵犯了无数受版权保护的图像。

四是在AIGC模式下创意主体“灵韵”的消失。弗洛姆曾说,“在过去人们面临的危险是变成奴隶,而在将来危险是人类可能变成机器人”。之所以“危险”,不仅在于创意阶层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与松散,而且面临着消解和“灵韵”消失的可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辅助,其文化内容创作易陷入对现有文化资源重复使用的循环而缺乏原创性创新,长此以往将会制约人的主体性创新。

遵循科技伦理实现文化守正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破坏性创新,其创新速度和创新强度成为新旧文化此消彼长的关键影响因素。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其《数字化崇拜》中强调“技术只有摆脱了神话般的偶像崇拜,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须理性对待和积极应对,特别是关注其介入人类的文化生产领域所

带来的文化创新边界命题,遵守人工智能文化科技伦理规范,实现人工智能价值对齐和文化守正创新的同步。

一是利用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应对人工智能算法黑箱。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来简史》中强调“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基于大数据“喂养”成长起来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带来的技术变革和文化变革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减,而是生态式革命,潜藏着数智鸿沟、文化鸿沟、算法污染、深度伪造等新问题新情况。由此,亟须加快制定更具前瞻性和实操性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与科技伦理的制度创新;构建基于社会效益和人文价值为导向、以文化创新与数据保护同步的政策法规体系,构建和发展负责任、自主、可信、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保障体系。

二是遵循人工智能价值对齐,实现文化守正创新。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文化生产与人工智能技术是相互独立的系统,两者的融合是文化元素与技术元素相互融通,相互协同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一方面,伴随人工智能算法的不断演进和算法污染问题的频出,立足“守正创新”,坚守人工智能价值对齐是原则和基准。另一方面,立足本土文化大数据优化AIGC模式,加快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本土大数据语料库,赋能AIGC本土化创新。此外,在人机协同塑造文化新范式过程中,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创意、情感与价值判断如何和人工智能完美结合,确保具有情感和审美力的“人”作为主体,实现人机“共同进化”,这是智能时代文化创新的内核与关键所在。

三是立足人类主体性地位,实现人工智能赋权的多主体自我变革。制度创新主体须做好顶层设计与思维变革,以预见性制度创新应对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加速度和算法迭代;文化企业应立足数据思维、技术思维和伦理思维,加快研发与最大化利用AIGC以实现降本增效,同时要实现自主版权及其版权保护策略的与时俱进;文化消费者要学会辨识深度合成乃至深度伪造,实现内容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多重角色合一的身份转变;文化从业者则要做好终身学习规划,关注个体自我的内在成长,关注创造力、创新力、情感力、批判思维的能力建构,以共建共享思维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新論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便是其中元素之一。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和精髓要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

家国情怀最初是一种由内而外、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己一家一国”这一由内而外的推演是家国情怀最初的表现。《礼记·大学》强调:“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也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是一体同构的,有“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的说法。西汉的司马迁说:“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到了东汉,经学家马融说:“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也就是说,个人的忠诚,起于自身,表现在家庭之中,而完成于献身国家的事业中。这些思想凝聚而成的由内而外、家国同构的秩序,成为家国情怀最初也是最深沉的积淀。

在士大夫阶层的传承下,家国情怀演变为中国统一和中华文明的认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播,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家国情怀逐渐成为一种保家卫国、政治统一和文明认同的表达。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张为的“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些诗句中饱含着尽忠为国、以身许国的传统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背后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强烈认同,是家国情怀的传承丰富。

在近代,家国情怀发展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内在动力。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以家国情怀为基础的爱国主义,转化成为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捍卫中华文明的强大动力。面对近代的严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知识界关于“黄帝子孙”“炎黄子孙”的认同,顾念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讨论,同样充分彰显了家国情怀下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团结御侮的强大精神动力。

家国情怀拥有丰富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修身示范是基本要求。家国情怀对每一个人提出了内在要求。古圣先贤治理国家,必须先要充实自身的内在修为,而后才能建立功业。《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了修身对于家国情怀塑造的基础作用。一个人对国家的担当和责任,只有先从管理好自己开始,才能“推己及人”“修己以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融为一体,是中国士大夫人生理想的实现路径,揭示了家国情怀的基本要求。

家国同构是显著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同构,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与国相辅相成、休戚与共。先秦时期,家国同构是家国情怀的政治基础。周代制礼作乐,大夫的封地称为“家”,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天子居于“中国”而有“天下”。此后的历史虽然与周代的分封制不同,但是“家国天下”作为一种宏大而细腻的民族情感,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中华文化视“天下之本在家,国之本在家之本在身”,主张“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这些对个体与他人、个人与民族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体现出对家庭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立场与要求。

责任担当是核心内涵。“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家国情怀的一个核心要求,即每一个个体应当具备责任担当意识、履行责任担当精神。责任是担当的内在本质,担当是责任的行为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这是新时代对担当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责任担当始终是中华民族所提倡和追求的优秀精神品质,也是传承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

以古照今,家国情怀形成了鲜明的时代价值。

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在于自我的修养、家风的涵养和家教的养成。个人的自我修养,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基础。新时代提倡家国情怀,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家风家教的重要性。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为一体,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重责山岳、公而忘私的大义,在塑造和传承新时代优良家风中筑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正家风、齐家规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将爱国和爱家统一起来,彰显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生动诠释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含义。正是在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驱动下,中国共产党人将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厚植家国情怀上起到了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作用。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精髓要义。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凝结着中国人对家国共同体归属认同、责任使命、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价值信仰,对于认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激发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各个民族成为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家国情怀的归宿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家国情怀逐渐融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家国情怀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宝库和动力源泉。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

刘本森